

再 谈《女 学 报》

杜 继 珑

潘天祺同志在《谈中国近代第一份女报——〈女学报〉》(载本刊今年第三期)篇里，指出张静庐同志认为中国近代第一份女报是1902年陈撷芬创办的《女学报》的论断不符合实际情况；根据已掌握的材料说明中国第一份女报应该是1898年上海中国女学会主办的《女学报》；这是很好的发现与订正。可惜他所见到的只有《女学报》第二、三两期，因而未能作全面介绍，但他阐明这个妇女刊物的维新立宪的政治立场，和创刊期的推断，却是解决了问题的。

《女学报》的创刊期，是1898年7月24日。我所见到的，是第1期至第12期；最后一期，出版于9月15日。第13期以下未见。开本各期相同，对开纸单面石印一大张，可以裁叠成四页装订。创刊号红印，内容为《皇后慈容叙》、《女学报缘起》、《魏恭人书》、《法国女学会》及《中国女学堂启》，末附《女学会书塾创办章程》。以下各期，体例亦不外“四个大段：一论说，二新闻，三征文，四告白”，内容“多是关系女学纲目：修身、教育、家事、体操、官话、汉文、洋文、史学、地理、算学、物名、格致、习字、绘画、裁缝、音乐十六课的事情”(《上海〈女学报〉缘起》)。

《女学报》的刊行期，前后历时约三个多月。论著方面，从第一期的《女学报缘起》起，到第12期《创兴女学论》，约有二十余篇。从内容方面不难看出，当时进步的知识分子妇女，对兴办女学、创办女报、组女学会、要求解放的如饥似渴的心情。

论著里有6篇是关于《女学报》的：《上海〈女学报〉缘起》(潘璇)、《论〈女学报〉难处和中外女子相助的理法》(潘璇)、《〈女学报〉缘起》(吴逸)、《论〈女学报〉所以扶助女学堂之不足》(沈翠英)、《〈女学报〉叙》(薛绍徽)、《〈女学报〉叙》(孙蘊)。其间，以潘璇所论《女学报》的四件好处，最为具体：

“第一件，这女学会、女学堂、女学报三桩事情，好比一株果树，女学会是个根本，女学堂是个果子，女学报是个叶、是朵花。人要知道这树什么树，盛不盛，能不能结果子，不是要先瞧这花和叶吗？

第二件，女学会内的人，有了这报，知道会中一



《女学报》第一期报头

切事情。报上有那些新闻时事，主笔新编的女学演义，看了可以解闷，可以消闲。况且长了許多見識，闊了多少胸襟。

第三件，中国古来女子识字读书的法则，太不讲究。本报体例有次叙、字眼不深奥，可以补那个缺处，我们这报，不致文义太深，看了不懂。字句皆雅俗共赏，所论多女子实学。

第四件，本报专用官话，可以随口读出。一个人读，能数十人听；一个人看，能数十人知，岂不是爽快的么？”

只是《女学报》在实践上并没有完全做到。譬如白话（官话）一层，原说“雅三俗七”，实际情况却是完全相反的。编辑部内部的意见就不统一。所以，报名原定《官话女学报》，后来也不得不删去

“官話”二字。关于女学堂的論著有11篇：《中国倡設女学堂启》、《劝兴女学启》（刘紱兰），《女学利弊》（康同薇），《論女学堂与男学堂并重》（裘毓芳），《論中国創兴女学实有裨于大局》（蒋婉芳），《論女学为自强根本》（謝芝），《节燒香还願費扩充女学說》（楊兰貞），《創兴女学論》（程漪），《女学歌》（刘覩），《中国女学堂章程》，《潮州饒平县隆都前溪乡女学堂記》。

这些論著，从各方面宣传“男女平等，施教劝学”，认为办女学堂，是中国妇女解放，国富民强的一个根本性問題。所以又有《男女平等論》（王春林），《女子爱国說》（卢翠）一类的宣传文字。她们还认为妇女一定要有自己的組織，才能逐渐得到解放，因此除进行組織外，还发表了《女学会說略》、《法国女学会》等一些有关的文献。

《女学报》所发表、所宣传的当时妇女解放全部計劃和步驟就是这样。她们提倡民主，相信科学，强调劳动。发表有关紡織与縫紉机、蚕桑与显微鏡用处之类不悖“中学为体、西学为用”的图文。劝妇女学医（瞿玉芬《医学論》），劝妇女从事运动，注意健康（《体操图》）。还发表了重視中国女工的有历史意义的可貴紀录：

“現在查得上海繅絲厂、紡織局南北共有五十几家。凡妇女工作之处，其余茶棧、鸡毛棧，还不在其中。无论繅絲紡織，一家大的，每天人数不下二千人，小的亦有千余人。这样統計，每家一千五百人，上海女工，已有六、七万数目了。这上海女工的茂盛，可想見一斑。”（《女工志盛》）

数目虽不明确，这样难以找到的保存下来的資料，究竟是可貴的。至于工資方面，曾經看到过簡略的記載，說当时男工最高的工資是銀五角，普通工每天連伙食只有三角到三角六分，女工工資极低，每日从五分起到二角止。工作時間，每天达十二至十四小时，星期也不一定有假期。足見当时工人如何被剥削，以及生活的艰苦情况。此外，《女学报》的插图，估計在当时也是很吸引讀者的。每期一面，有《裙钗大会图》、《上海桂墅里女学堂图》、《上海女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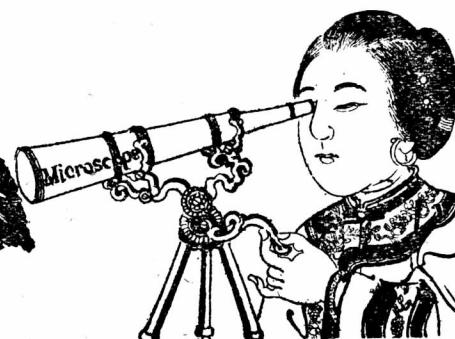


地图》、《女紅鐵車图》、《体操图》、《蚕桑图》、《織绣图》、《梳洗图》、《縫紉图》、《紡織养姑图》，等等，是女画家刘可青（覩）等所繪，她似曾学过西洋繪画，但又具有濃烈的中国工笔画傳統，笔触十分細膩。

《女学报》也发表了一些文艺作品，較可称的，有織云《蚕桑歌》，反映了当时中国絲織业为帝国主义經濟侵略摧毀的一些惨痛情況。不过，結合在《女学报》里所发表的绝大部分論著看，虽然一面說明她們的进步性，一面也很显著的反映了她們維新立宪的、改良主义的主張的不彻底性，从而也就不可能有什么成就。

在《女学报》第八期里，載有光緒帝的上諭，就是有名的“百日維新”的訃文。1898年九月二十一日，慈禧命榮祿逮捕光緒帝，囚之瀛台，并以皇帝名义发布此諭旨。至此“百日維新”就宣告結束，康梁逃往日本，慈禧重又执政。也就这在一期上，出現了两件与政变有关的事情：其一，是主笔姓名栏中少了六人：除康同薇（康有为的女儿）外，还有李惠仙（梁启超的夫人）、廖佩琼、睢念劬、丁素清、周远香。其二，是取消了原来設在北市泥城桥的“不經足会”的代銷处。按該會主要負責人康广仁，就是戊戌政变被害的六君子之一。又在九月初五出版的第十期上，除增加了一个美国主笔林瑪萊之外，女学堂也增加了广学会总局英国人李提摩太处的报名处。这两个外国人的出現，很明白是为着政变，用金錢买来，給《女学报》起“洋商”擋箭牌的作用的。

至于《女学报》究竟在什么时候停刊，以及一共出了多少期等問題，正如潘天禎同志所說，由于材料不足，目前还难以說明，可以肯定的是，“百日維新”失敗初期，《女学报》虽受到一些影响，却仍在繼續刊行。



《蚕桑图》之一